

甯謨：韋爾斯著

婦女革命

新時代出版社印行

命 革 與 女 婦

著 斯 爾 韋 : 漢 甯

1 9 3 9

社 版 出 代 時 新 港 香

無產階級的領袖——劉羣先

當我住在蘇區時，我跟劉羣先混得很熟。我在延安時見過她許多次，九月裏到西安去時，路上又跟她同行。她是一個親切、和藹、而又富於熱情的人，就是我丈夫去年在蘇區時，對她亦很有好感。在蘇區裏，真正出身無產階級的領袖只有幾個：像劉羣先、無錫的女工；蔡樹藩（男）漢冶萍礦工的領導者；陳慧清，香港的女工；以及王震，湖南的鐵路工人等。

這些人都都異常熱誠和真摯。我不曉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在心理上，對於別種族的對外種人是否全是親切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對外國人像天生的沒有什麼好感，農民們則很冷淡；只有無產階級才是親切的。我在延安遇到的工人們，他們好像沒有「祖國」，把我當作他們中間的一個似的，全是不分彼此，隨便自由地談論着。

當我遇到劉羣先時，她對我說：『我最末認得的美國女朋友，就是在武漢認識的拉娜·勃拉姆』

第二次看到她時，他領着我去看他那個剛週歲的小孩。我衷心地告訴她說，這小孩是我見到的中國小孩中頂漂亮的一個，而且又像她的父親。（他的父親就是博古，蘇區的外交首席，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與劉羣先結婚。）聽我這麼說，他馬上問我願不願意收養她：

『我真是大忙了，而且這裏的環境實在大不宜於小孩的生長，』她訴說着。『這小孩是男的』。

劉羣先今年二十九歲，身體短小結實，兩手粗大樣子很幹練。她是一個漂亮的人，有一頭光艷的頭髮和一身柔滑的肌膚，聲音低而愉快，又有一種慣喜閃動睫毛，或是像小孩子一樣，張大眼睛瞪爾的習氣。我在蘇區見到的許多人中，最最富於感情的怕就是她，她有時突然發怒，有時則非常熱情。當她在改正人家的錯誤時，她是不惜嚴詞勸責的。我曾在延安的工會裏聽過她的演講；

她實在是一個懇摯的，善於說服的演說家，亦許這一點正說明她在工人階級中之所以富於人望吧。至於對那些受難的人，她是仁慈而且充滿同情的。當她把一九二七年和長征這兩個死者無法計算的時期裏的事情告訴我時，有幾次竟眼淚盈眶，不勝哀感，恍惚她的故事有一兩段是浸在眼淚裏似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是冰冷無情的。那麼劉羣先將是一個使他們震驚的人物。

中，最豐富於感情的性格是她，她有時突然發怒，有時則非常熱情。當她在改正人家的錯誤時，她是不惜嚴詞勸責的。我曾在延安的工會裏聽過她的演講；

她實在是一個懇摯的，善於說服的演說家，亦許這一點正說明她在工人階級中之所以富於人望吧。至於對那些受難的人，她是仁慈而且充滿同情的。當她把一九二七年和長征這兩個死者無法計算的時期裏的事情告訴我時，有幾次竟眼淚盈眶，不勝哀感，恍惚她的故事有一兩段是浸在眼淚裏似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是冰冷無情的。那麼劉羣先將是一個使他們震驚的人物。

劉羣先身份之高，並不是因為她被舉為國有礦場工廠的指導員，而是因為她是蘇區婦女陣綫的剛勇的領袖。她好像是一個天生的「代表」專代表女性以與女性的錯誤鬥爭。十年前，她是無錫蠟絲廠女工的代表，後來又是派赴各種勞工會議的代表，而且不論她在什麼地方，她都是女工部的部長。在長征時，她是婦女隊的隊長，路上親身從地主倉廩裏取得她們的給養，劉羣先實在可以代表所有的蘇維埃婦女，她是她們的革命的代言人，只要有誰對蘇維埃婦女苦得來的權利稍微有一點侵害，她立刻就發覺，而且馬上動員一切保衛牠，絕不讓中國女性新獲得的自由，受到一點兒的侵害。

我在下面所寫的故事，完全是照她告訴我的寫下來，因為她價值就在於她忠實地，不自覺地顯露了一個中國的女工與經驗，而且說得恰當好處。她對中國女工生活的忠實的敘述，和對蘇俄以及蘇維埃中國的印象，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

當劉琴先成爲共產黨員時，在窮人中間，甚至懷疑命運這事情，亦是革命的。她的故事對中國落後鄉村的殘忍與迷信，有着明晰的描述，雖然她是生於無錫附近的，而無錫又是中國最進步的，爲上海之外最大的一個工業中心。

『爲了我出世的時候，家裏恰好有人死去；因此村裏的人都說我命硬，同家的人亦迷信地怨恨着我，誠恐我給他們帶來了不祥。在所有的親族中，不討厭我的，只有我的母親一人。我生下來剛十八天，父親便死去了，三年之後，祖父和叔父亦先後過世。』

『一九〇七年，我生於無錫附近的一個鄉村裏。無錫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

工業中心。我的祖父靠拾糞過活，父親，則專門和着刷牆角的石灰，由此你可以看出，我出身的家庭是多麼的寒賤。在祖父和叔父還沒有死去以前，我們家裏一總有十五個人，後來因為這三個掙錢養家的人都死去了，家裏窮極，不得已分了家，由各人自己設法過活。當我出世的時候，我的姊姊已經九歲，哥哥亦已六歲了，而分家之後，我們只分得半處房子和兩畝田。母親老是憂鬱不歡，而且有了很重的氣喘病，她全靠養蠶和紡絲線來養活我們。到了我九歲時候，我和姊姊兩人結髮鬮出賣，當時中國女人頭上都戴着髮網，我們兩個人一天能夠結十四个，每兩個賣給小販們三個銅仙，而小販則賣兩銅仙一個。到了春天，我還到山上拾蠶，等到牠結成繭時，再把牠賣出去，這是一種掃除的工作，因為在我們那地方，蠶子很多，這些都是人家丟掉的。

「我的姊姊上了兩年學，費用由她夫家供給。我呢，因為婚姻還沒完妥，無人幫忙，但我却堅持着要上學，爲了這事情跟母親吵鬧。最後，我終於上了一年學，由我自己掙錢繳費，當時一年學費只要一塊錢。」

「我是一個非常頑皮的野孩子。我的三個同寅伙伴，在七歲的時候，都已定了婚；但我却咒罵那些對我家裏的媒人，弄得他們再也不敢上我們家裏來，當時我咒罵他們，因為我不高興嫁給人家，願意留在家裏。在我們那裏，都有賣藥媳的風習，小女孩從小就送到別人家當奴婢用，長大了再當老婆。」

「我們村裏，有一家地位很高的富人，曾經借錢給我們，收頂高的利息。他有一個姪兒正要討老婆，爲了我強壯美麗，很可以作一個好奴婢，因此看中了我。他自己有一個小汽艇，有一天，他要我去坐船玩玩，想更進一步認識我，但我拒絕他，逃在外面一整天。那時我只有十歲，爲了有錢人家對窮人的虐待，我痛恨那些有錢的人們。我又害怕這個人和他的那條小汽艇，因爲河上所有的汽艇都是官府的，而且是用來收捐收稅的。我記得當他坐着那小汽艇到我家來的時候，我的叔父就得把他們收成的東西當作租穀，還給他們。」

「我的母親求我同意這門婚姻，因爲這人家很富裕，願意出很高的價錢，而她自己又病得那樣厲害，再也沒功夫看顧我。但我痛恨這種念頭，拒絕了她

「我的長髮才我同意這門媒妁，因為這人窮得露骨，願意出很貴的價錢，而她自己又病得那樣厲害，再也沒功夫看顧我。但我痛恨這種念頭，拒絕了她。」但是，無論如何，我的哥哥已到了應結婚的年齡，需要很大的一筆錢來辦他的婚禮。而除把我賣了之外，再也沒有辦法籌到這筆錢，因此爲了減除母親的煩惱，我答應跟別的人家配婚。但是有一個條件，這人家必須住在城裏。因爲我看見城裏的，吃的好，穿的好，而鄉下人的景况却一年不如一年。同時，我也注意到，就在鄉下人越發窮困的時候，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員却越發富有。這道理我不懂，心裏很迷惑，但無論如何恨死這些官僚。

「到了拾一歲的時候，我就跟一家在美孚火油公司當技師的人家配婚。這技師偷了一些火油，又從公署裏榨了好一筆錢。自己開辦了一家小紗廠。我的表兄弟，就在這廠裏當學徒。姨母代他進行這件事，把我買了去。做他繼子（他自己沒有孩子。）的老婆。錢一付出，我的兄弟便舉行他的婚禮，我也到那技師家裏，在正式結婚之前，做他家的一個「小老婆」。

「我的家雖然窮，但我在家一向是很自由的。到了這裏，實際上却成爲一個囚犯。同時離開了母親使我非常傷心，她非常愛我，從不會打我，只有一次

我的叔父——一個窮鞋匠——的屋子給颶風吹塌了後，幸而建了座新屋子，當他在他的新屋裏請我們吃喜酒的時候，我的母親帶了我去做客，我喝了好一些酒，就喝醉了，母親生氣打了我。在新屋子裏哭是倒楣的兆頭，因此母親又因為這事再打了我。這迷信使我生氣，我有一個星期不跟我的母親說話。

『在這家廳裏，我每天清早和午夜必須在尊嚴師和他們的老婆面前叩頭請安。早上，他們還在床上，我就得拿茶水，香燭，自來火等待候他們。晚上，一點，我更不能上床，因為我得等着他們叩頭。在我自己家裏，我常常覺得很早，所以這些事弄得我非常疲。吃飯的時候，我必須非常卑恭，這使我感到害怕，以後從沒有一次吃飽飯。他們對我說：「別忙，吃得緩一點！」因此我就不能多吃。我絕對不能跑到街上，依照中國的習慣，窮女孩子是可以出去，但富人家，却不能如此，甚至就是管家的大大們在街上行走，亦要給人家當娼妓看待的。』

「在他們家裏，我用不着上廚房，因為有許多奴婢做這事情。但我得侍候

他們抽鴉片。那技師老上窩子館去，爲了這事情，他的老婆時常跟他吵架，又更加多抽了些鴉片烟。

『這生活使我厭倦，我恨極那地方。我在那裏只有一個朋友，那就是睡在我房子裏的那個年輕的女婢，每當我想到我竟當了這樣人家的媳婦時，我心裏就難過。我恨死那個要同我結婚的男孩，要是我手裏有鎗，一定打死他。我始終不跟他說話，一句亦不說。這是中國的老規矩，結婚前住在男家的女孩，不能同她未來的丈夫講話。這頓蛤子知道我恨他，非常怕我，不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我靠近他邊，而他又想走過去的時候，我就堵住不讓他通過。這另外的至母是一個絲廠的女工。

『不久之後，技師的老婆恨死我，我在那兒的生活就萬分困難了。我變得衰弱孱瘦，因此母親把我領回去，在家裏住了一年左右，專靠織襪子過活。接着，母親死了。鄉裏的人全都老話重提：「這女孩是掃帚星！」我們不得不出處借貸，湊集二十元買一具棺材。這筆款定五年償還。月利二分，用我們的地契

作押。我的哥哥希望當個學徒，但找不到，因此我們更加窮得可憐。

『年關時候，許多債主都跑家裏來要錢，哥哥和嫂嫂只好逃到親戚家，留下我一人聽他們的辱罵。我們從未吃飽。開頭；我織襪子的本藝很差，織好的襪子時常給退回來，實在難得靠這手藝過活。我嫂嫂不得已回她娘家去了。爲了我母親的死，爲着我的飢餓，我無時不在哭泣。』

『到了我十三歲時，那技師遺下一盤一萬元的欠債死去了。債主封閉他的工廠，雖然親戚們竭力想爭牠回來，但全都無效，工廠賣了三千塊錢，依照法律，還了三成債。此外還留下五百塊錢，技師的老婆二百元，那男孩也是二百元，一個新的妻則分到一百元，但那孩子却從未領到這兩百元錢。不久之後，那老婆亦死了，這樣，我已沒有可以寄身的地方，前途實在是一片漆黑。我本想到嫂嫂家去住，但她拒絕我，因爲我命運硬，恐怕尅了他們。村裏的人都蔑視我，把我的「苦命」當作笑談。在這時候，我多少相信我自己的命運實在是乖舛的。』

「接着我的未婚夫不得不把他的養父養母的棺材，運到「大湖附近的一個村落裏——那裏有着一座出產黃石的山——以便埋葬。我隨着這兩個棺材去，在這村裡，我跟未婚夫的一個表兄弟住了幾個月，每天到處砍柴和拾菓。我的表嫂不願我離開。想把我當他們的婢女。村裡有一隻船每天早上開往城裡，因此，有一天早上早餐後，我便想搭了這船逃走，我爬上那座石山，但山頂有一個大坑，無法跳過，於是我不得不繞了個大彎，就在這時候，我錯過了開船的時問。第二次我想逃走時，那婦人捉住了我，咒罵我說：「我是一口井，你是木桶裡的水，你一倒下來就永遠跑不開」！我沒有辦法，跟牠大吵一場，在新年快到的時候，我大哭大鬧，雖然這是一種禁戒，——新年號哭是要招來貧困和倒霉的。

「最後，我終於逃了出來，到了我們鄉裏，那時正是陰歷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年是快到了，但我既沒有地方容身，又沒有錢。

「先前我做手套和襪子時，曾省下五塊錢，放在一位親戚家裏，我希望能

够拿回來濟急，但她却早就逃了，連我這筆錢亦給捲走。富人蔑視我，因為我是個窮女孩；窮人們亦蔑視我，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個苦命鬼。這樣，我非常痛苦，而且更加相信我自己實在是苦命的了。

『我到我姊姊那裡，後來又到我嫂嫂家裡去，但她拒絕我，甚至不同我說話，也不給我吃的東西。最後，我的姨母要我到她家裡寄食，而我那七十歲的外祖母見到我時，竟憐憫得哭了起來。』

無錫的工廠生活

『在那我們那裏，有一種迷信說：只要你在大年夜裡做了夢，不管這夢是好是壞，你這一年一定會交好運。在那一年的大年夜裡，我居然做了一場夢！我是這樣快活，那天一早就起身，打開房門，凝看東方的藍天和雲彩。我把這夢告訴我姨母，她說這一種好兆頭，要是我在工廠裡找到生活，我一定會成功的』

。但在我們家裡，不管家境多麼困窮，送女孩上工廠做工，是一種丟臉的事。然而在陰曆正月初五日，我終於到城裡去，在一家工廠裡找到了工作，那時候我只十四歲，找到一間住着一對夫妻的房子，這於我十分不便，但我用不着付房錢。我自己燒飯，生活非常貧苦。後來，有一天晚上八點鐘時候，所有的工人都放假了，我碰巧遇到幾個同鄉，心裡萬分快活。他們到我的地方來，把我的東西帶到他們的工人宿舍去。

『這絨布廠叫慶豐紗廠，廠主姓唐，工頭則是我們的同鄉。我們每天早上四點半鐘開工，要到晚上八點或九點散工，一共做十六個鐘頭。我們是在廠裡吃飯的，邊吃邊作。因為廠裡的工頭是我們鄉裡的人，他對我們很好，所以我並不痛苦，但却非常疲倦，我一整天必須不停地繞着機器走，連站住歇一會都不能。報酬是按工作的總額計算的，我每天約摸掙二角錢。做了一個半月，我只得到二塊七角錢。依照工作的慣例，開頭一個禮拜是沒有報酬的，而且，如果你是在正月裡開始工作的，你就不得不等到二月半，方才領得到正月上半月

的工資，這是用來使工人們繼續做下去，不敢中途離開的一個方法。當我接到這兩塊七角錢時，我很爲失望，竟至哭了起來。

『因爲工資太低，我轉到一家絲廠去，這是我姨母介紹的，他是一個工頭。開頭我的外祖母曾陪伴我，因爲廠裡一個熟人都沒有。開始工作的頭一天，有許多男人圍着我，擁抱我，我非常驚懼和害羞。爲了這工廠裡男女工的關係很爲猥褻，我終于離開那兒，重回到紗廠裡來。我的技術緩緩改進了，我已能夠多得些工錢。三年後，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一月的工資已有二十元，可以省下錢來，幫助我那可憐的哥哥和嫂嫂，爲了我能够掙錢，我和家庭間的關係現在是很好了。他們以及鄉裡的人再也不提到我的「苦命」了。不久之後，我們許多同鄉亦進廠工作。但我仍感到自己很爲可憐，因爲我不像別人，有母親給我縫衣燒飯。

『有一天，我決去看一個算命者。開頭我穿着一件破舊的衣衫，他對我說：「你的命不好！」過後，我改穿新衣去見他，於是他對我說：「你的命好」。因

此我相信了我的新思想——所謂「命」，完全是瞎說的，那只是經濟的問題罷了。這使我不再害怕命運，但我仍不滿意那家工作。

「開頭，工廠裡的規律十分寬弛，後來非常嚴酷，要是早上在四點半開工時遲到十分鐘，工頭就咒罵我們。工廠裡有許多小孩，在四點時他們是那樣的疲倦和渴睡，以致時常啼哭。我常常訝疑、僅只爲着糊口，幹什麼要在全城還在酣睡的時候開始工作呢？我們統統在黎明之前工作，到晚上八點方才回來，因此我們有幾月從未看見青天，有一些人竟有幾年沒有見過大陽。每天我向我自己：「這苦生活什麼時候才能終止！而且祈望當天的工作早些兒完結。」

「我們是按月計錢的，要是機器損壞或停止，生產降低，我們工資亦就減少，因此我們害怕機器，不得不小心保護牠，好像牠是非常神祕珍貴的東西似的。每當機器損壞時，稽查員便以減低工資處罰工人，有時甚至還要償付修理機械的費用。」

「我們是有着「大洋」和「小洋」的，要是一個工人給罰了五分錢。那麼餘下

的九角五分常常是用小洋支付，因此我們又遭一番損失。

『每一個工頭管理六十部機器，而每一部機器要生產六匹布。要是只少一點點，工頭便毒罵和處罰工人。要工你做得多，工頭就有賞錢，因此他管東得非常厲害。工頭每天的工錢只有六角，收入全靠外快，每天散工之後，他的工人的飯籃都經過搜索，連女工的褲筒也要搜查。爲了這我與每個人都得穿過一條狹小的走廊。廠裏日下工人三千六百彈則。』

『我恨那工廠。也恨牠的主人。我不曉得他怎麼會如此富有，他的孩子剛從英國回來，負責管理這個工廠。工廠恭敬地稱他「少主」。他對我們這些女工，即連上廁所一兩分鐘，亦要吃他一頓毒罵。我腳手輕快些，比別人生產得多，被人尊爲老手，因此工頭對待我比對別人好一些。在工廠裡，要是那個女工長得漂亮，就比年紀大的或小的多佔便宜，廠裡對年紀大的和年紀小的工人很殘酷，童工還要挨打。但要是你長得漂亮而又貞潔的話，待遇亦時常是很優的，只有那些墮落的女人才會佔便宜。我跟別的九個女人住在同一間房子裡，

其中有兩個年紀大——至少三十六歲——都已結婚，而且十分貞潔，工頭對她們很壞，她們恨她，故意遲到廠裡來激怒她。因為就是早到，她們所等待遇的惡運，已是無復加的了。

一九二四年冬天，一個年青的女工從高處跌下來，落在一架女機器上，給輾死了。爲了這一件事，一羣工人開始怠工三週之久，這廠方給她家錢三十塊錢。我們不曉得怠工的政治的意義；這次純粹是自私的。等到後來，那些由上海來受傷的，曾經多少受過政治訓練的工人們，便領導了我們全部的活動。

有一次，我的長頭髮給機器咬住了，因為我不能去把它剪去。在我看來，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短髮」時期的象徵。我的手亦曾受過一次傷。工人們的眼睛因爲過度的緊張，時常弄得失明。

『我們是最痛恨那個工頭。我時常氣得把棉花擲在地板上，不管她如何迫我，我死也不把牠檢起來。有幾天，我到廠遲了些，爲了這些行爲，廠方認爲我在廠裏發生惡的影響，把我開除。』

『於是我轉到榮家所開的申新紗廠去，榮家是中國最大的產業資本家。我每夜工作十二小時，由晚六點到晨六點，工資非常少。當時食物已經很貴了，每月單吃飯就要化到六塊錢，同時還得付三角錢的房租。』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無產階級

『當我在那裏做了六個月之後「一九二五年」，我遇到一個共產黨員。他是從上海來的機器修理匠。一九二六年，我們舉行了一次罷工，有十二個工人被捕，判了十二年徒刑，罪名是共產黨，他們全然不是共產黨員，當時我們廠裏亦沒有共產黨的組織，但自此之後，我却繼續跟這從上海來的共產黨員接觸。他對我非常好。我不懂得共產主義的真實意義，但我喜歡這個共產黨員的行爲，他拿書給讀，對我說：「這些是很好的書，你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買不到，因此你要絕對保守秘密，不要把牠給任何人」。我把那些書放在袋裏，但開頭我還不曉得，他說的話的意思。』

『我住在一個地主家裡，他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在小學裡唸書。我有不懂的地方便問這個小孩；但他又那拿去轉問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一個稅吏，他一看這書心裏非常生氣。他告訴我，這些書是共產黨的宣傳品，要是被人發見，我就得砍頭。他對這事倒很客氣，不過把我滾了出來。這樣我又在一個警察家裡借了一間房子——一星期後，我所有一切的东西竟給人家偷光了！我沒有地方可住，亦沒有衣服穿，因此跑到女工宿舍，跟別的女人睡在一起共產黨時常在那裏鬧着秘密會議；因此我亦入黨，但不曉得什麼綱領。當時，我從未聽過五卅慘案，後來一些女工方才把這件事告訴我。

『我們有一個工會，但並不健全，無論如何，那些由上海來的工人，對共產黨的綱領完全明白。在秘密會議裏，這些工人和共產黨員便從事宣傳，他們對我說：「你們甚至連牛馬都不如，牛馬至少還看得休息，你們一天却做十六小時的工。爲什麼你們的生活會這樣苦呢？這不是命運，而是資本家的壓迫。因此我們應該聯合起來，跟資本家鬥爭！」在每一次秘密會議之後，我都非常

激動，而且其誠懇感到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

「這些事我從未缺席，亦聽了許多關於國民黨和國軍勝利的消息。在前二次會議之後，爲了想到這些新思想，我簡直要發狂，無法工作，不斷地團團轉。我極願把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上海的五卅慘案這些事情告訴我的同伴們。機器的轟聲是高的，因此我不得把聲音提得更高。爲了這些談話，我弄得沙啞失聲。每星期日，我盡我所能地招集女工們參加會議，但因爲星期日她們洗衣服或是回家，大都沒有工夫，到會的只有幾個人而已。我對她們說的話，她們全都同意，聽了很開心，但因爲有些人不能到會我心裏很難過。

「就在這時候，許多上海的工人到無錫來，他們都是五卅運動中被開除的非常革命的份子。

「這個新工廠的工頭，開頭對我們非常好。現在却殘酷起來了，因爲我放棄工作去參加黨的會議。當時廠方當局給其黨的秘密活動弄得非常恐怖。

「我是熱誠的。我刻苦地做着黨的工作。有一次我遇到黨的負責人，我說

：「我的工作很難展開。我跟許多人談話，他們都很同情，但因沒有時間，所以未能參加會議。」

『他回答我說：「但是你應當繼續刻苦工作，因為中國的革命工作應當在三年之內完成」。』

『當我聽到這話之後，我感到輕鬆，決定用不着操之過急，因為三年看來是很長的呵！但察是他們說：「三個月」的話，無論如何，要我比當時所做的更加加緊是不可能的。這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黨的工作發展得極快，許多許多的工人加入工會和黨的組織中來。黨是秘密的，但我們已有了一百個黨員，後來還要增加。我們廠裏工人是五千人。』

『黨把我調到婦女運動部。我在第一夜被僱的進豐紗廠做這工作，不久便爲了這個紗廠方開除。當時差不多每個工廠都有黨的支部。紗廠的工人要比絲廠的工人好，因為縲絲的大都是較落後的女工，紗廠却是男人居多，而從上海來

的那些受過政治訓練的工人，又多半是棉紗工人。在絲廠方面，無論如何，我們亦舉行過一次罷工，女工們英勇地戰鬥着，在盛怒之下，打毀了工廠的玻璃，雖然紗廠工人們鬥爭還要厲害些。一九二六年四月，所有的絲廠全都罷工，約莫有二十個領袖被捕，後來釋放的只有幾個而已。

『我在進豐紗廠的工作非常成功，許多工人都參加秘密的集會。我被開除之後，進了另一家繅絲廠。在這時候，我是工人方面與資方談判的代表，成了無錫一個著名的勞工領袖。』

『一九二六年底，我們聽到北伐軍已打過來，張宗昌的軍隊快到無錫的消息。許多領袖害怕被砍頭，都逃避了。但我跟別的一些同志們仍然留下來，準備當國民黨軍隊最後到達無錫時歡迎他們，因為我們相信國民黨的軍隊是一定打勝仗的，在無錫所有的工廠裏，並沒有一個國民黨員，當時沒有一個工人加入國民黨，加入牠的只有學生。』

『我一向是很怕兵士的，但現在由於新的思想，我已有了新的勇氣。從城

裏商業中心到工業區去，中間有着軍營我必須經過這地方，但我一點亦不害怕。

『一九二七年二月，無錫所有工人發起總工會秘密地成立了，我們計劃給北伐軍一個盛大歡迎。二月底由各工廠派出的二百個代表在城外二十里的一個廟裏開秘密會議，我是赴會代表之一。在會裏我們通過一個決議：如果總工會總部下令各廠以罷工歡迎北伐軍時，所有的工廠都得響應。』

『這時候，我們黨的工作和組織已很堅強。三月十二日，當我們聽到蔣介石將軍統率的北伐軍就要佔據無錫時，我們隨即號召一個罷工。』

『所有無錫的工廠都加入這個罷工，並有三萬工人，步行到車站去歡迎北伐軍。我們北伐軍先到，而張宗昌的守城部隊，看見這一大隊不平常的隊伍，以爲我們就是國民黨的正規軍，他們仗亦不接的落花而逃——因此工人們不費一舉，便把無錫佔領了。當我們回來時，學生們亦參加進來歡迎進城的北伐軍。』

「國民黨佔領無錫之後，工會便公開活動了，女工們在運動中亦開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工會的領袖們非常忙，因為各工廠都要求總部派出組織者協助他們建立工會。我當時負責組織所有絲廠的女工。有一次，絲廠女工的代表跟資本家開了一整天的談判，結果我們的要求被接受。工人們的工資是增加了，工作時間是縮短了，早上開工的時間由四點半改爲五點，吃飯時候亦有短期的休息。以往工廠每月給工作優良者四角錢獎金，廠方企圖將他取消，但我們又壓迫廠方，結果他們被迫收回成命。」

「那時候，我們都感覺到！一切的工廠至少是屬以工人的了！所有的人都很快樂。每個工廠都有牠的工會和他們自己的辦事處。被捕的十二個領袖亦被釋放了，並且受了工人羣衆的盛大歡迎。但這些人被資本家所散買，後來就叛變了。他們盡力使這運動的風紀非常敗壞，以致破壞了我們的許多工會。等到他們叛變了的事情被人知道之後，女工們都很害怕工會，大家十分沮喪。」

「我曾經遇到一個青年的共產黨的領袖，名叫秦起，他對我特別感到興趣

。他的父親會做過滿清的官員，但家庭已經破產了，秦起曾經在一家麵粉廠裏的經理部做過事，麵粉廠關閉後，他失了業，因此開始努力工人運動。他從未曾把他真正的身世告訴人家，只竭力做成一個普通的工人。所有的人都非常尊敬他。當時共產黨的組織者差不多全都是學生，但工人們信託他們，和他們有着良好的關係，因為學生們並不看輕工人階級。我們都知道學生們有着很好的生活，其所以竭力推進勞工運動者，完全是由於他們的主義與理想。

『一九二七年五月，全國勞工大會在武漢開會，秦同志要我作代表跟他一道去出席，我同意他告訴我三萬里外有一個大國，名字叫蘇維埃俄羅斯，又說他不久之後，就要到那裏讀書。他問我是不是願意一道去，自然，我是急想做這一點的。』

『在這時候，國共兩黨的分裂已經開始，而革命的勢力非常高漲。有一次總工會召集一個群眾大會，到會的工人們結隊搗毀政府和國民黨的機關。國民黨非常憎恨這些人們，計劃殺害他們的領袖。（中略）在這個非常的時候，軍

採取壓制工人的行動，他們以爲無錫的工人跟上海的一樣，有着武裝，制了電力廠和電話局。但實際上我們都只有三條槍而已！

當時秦起同志非常忙碌，我和別的同志亦是一樣。我們時時刻刻準備着勦的開始。秦同志因爲知道他隨時都會被殺，特別拍了許多相片，分發他的許多朋友，有一天他來看我，給我十二張相片，要我長遠保存他。接

對我說：

「我的情形非常嚴重。國民黨隨時都可以殺我，要是我死了，你難過嗎

」我回答。

「對這回答，他似乎感不到滿足，他說：『要是你被殺了，我可非常難過

』這時候，上海的工會已經被破壞了，工人們亦被屠殺，因此無錫國民黨的軍隊準備採取同樣的行動。他們已不再害怕了，因爲那十二個好細已告訴他

們，說工人們完全沒有武器，因此他們才敢動手來毀壞我們的組織。

『有一個資本公司，我曾經作爲工人的代表跟他談判過，他想把我的名字告訴國民黨當局，叫他們捉我。但他後來又變了心，因爲他只有一個兒子非常珍愛，依照中國的迷信，如果一個人做了這麼一樁惡事，他的兒子亦是要死的，因此他把告密的事取消了。』

『在破壞工會總部的後一天，無錫到處發表着關於我的死亡的故事，我的親戚聞訊全都哭泣，並派人到無錫來打聽真相。他們發覺我並沒有死，於是我又再度返回老家。』

『我的未婚夫自從父死家破之後，亦在一家機器廠裏作事，亦已成爲一個共產黨員。這時候，他告我離開無錫。』

『自從這一事件之後，有許多工人被捕，但有許多人是逃脫了。所有的工人領袖已不能不逃難了。有許多人被秘密地處死，被難人數究竟多少，我不知道，但無錫被殺的無論如何沒有別的地方多。稍後，又有七個共產黨員同時被』

殺，我想，當時被殺者中，還沒有女人。

『在我們村裏，他們把我當作個危險的人物。我到處遭人鄙厭，那種把我當作「掃帚星」的厭惡之心又復流了。於是，我又不不得不離開。我記得當時只有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同情我，他對我說：「不用怕，國民黨從東邊來，你可以從西邊去的」。

『不久之後，黨內有人來找我，我跟黨的關係，是接上了。我把秦起的相片給他，叫他分散到各個工廠去。所有的女工都在他們的頭髮上結着白線用以哀悼他們的領袖之死。

『秦起被殺時，只有二十七歲。當我聽到他的死訊之後，我哭了許多時候，因為我非常喜歡他。但我過去時常怕羞，時常抑制，我對他的態度。自然，他亦是愛我的，而且要是他不死，我們兩人是會訂婚的。他自己還沒有與人訂婚，我亦會取消我已有的婚約。他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工人，平常只睡四個鐘頭像拿破崙一樣。

「無錫的工人要反抗國民黨的行動，但他們沒有武器，陳獨秀派亦反對這個辦法。同時，上海的失敗在無錫引起了沮喪的反響。當我們派往上海的兩個代表，帶着四月事件經過的消息回來後，無錫的工人便感到他們很願有成功的可能。要是上海的工人勝利了，無錫的工人一定亦會得到勝利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到了上海。那時候，還有許多工人被殺。當時處刑的方法非常殘酷，有許多是給「腰斬」的。我會到一位在無錫認得的黨員，他把我送到黨的某個秘密的辦事處裏住了幾天，隨即就作了參加全國勞工大會的代表動身到武漢。」

「那時候，武漢正被封鎖，物價非常昂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紙幣當時已經通行。大會閉幕之後，情勢越來越嚴重，而革命高潮亦越來越高漲。」

「那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名叫拉娜，勃洛姆的美國同志，我非常歡喜她，我們兩人時常一道吃飯。」

「我在武漢只住兩個月，便返回上海來。一回來，差不多所有的同志都已

被殺了，要跟黨取得關係，萬分困難。我住在一家非常蹩腳的小旅館裏，渡日非常艱難，一切全靠一個朋友支持。後來，聯繫接上了，我受命到莫斯科唸書。一九二七年十月，我便動身出國。

在蘇聯的一個中國女工

『我在莫斯科進東方大學。校裏只有四十個工人，其餘多半是學生。在這個字校裏，我們受過短期的軍事訓練，雖然我唸書很用功，但在開頭，什麼是社會科學，我一點亦不曉得。』

『同年年底，世界勞工大會開會，我是與會的代表之一。中國代表團的領袖是一九三一年在南京被殺的向忠發至五卅運動的著名勞工領袖王紹華（譯音）因在一九二七年被殺，所以沒有參加。中國代表是二十人，全世界各國代表總共一千人，到會這些來自各國的與會代表們，我心裏萬分的激奮。』

『大會剛剛開幕，「廣州公社」就出現了願與會代表們聽到了這消息，非常憂念。報上說在暴動中有一百位女性被殺，其中大半是女工，有的且是尙未成

年的女孩。同時，成千的男人亦被殺了。噩耗傳來，我們全都萬分悲痛。

『在大會中，我初次遇到正在孫逸仙大學唸書的博古，他在會場中担任翻譯，當時第一我五年計劃剛剛開始，聯邦政府集中全力於重工業方面，因此物價非常高，與會代表每天的食物得化盧布，因此有些代表感到生活很不舒適。博古向我說明這種情況的原因，又跟我討論建立社會主義的困難。這困難甚至要使代表們過着刻苦的生活。當我聽到這種談話時，我非常喜歡他，博古沒有參加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所以對我的敘述亦極感興趣，因此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多，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們就結婚，一直到現在。

『大會剛剛閉幕，孫逸仙夫人到了莫斯科，召集了一個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會議，我亦出席。會有許多外人，討論時大半是用英語，因此我沒有聽懂。孫夫人是非常漂亮的，當她剛剛到達，就有一位蘇維埃的藝術家給他畫了一張相。我非常敬愛她因為她對中山先生的大革命政策非常忠誠。她又善於講談，確是一位第一流的女政治家，同時又是所有中國女性應當做學的模範人物。

「第一，我曾親到各工廠去參觀，並在蘇維埃工人中作中國革命的宣傳，要求他們援助。他們是極其同情，連小孩們看見我訪問他們時，亦高呼「中國革命萬歲」的口號。他們這種共同聯合的親愛精神，使我非常感動，有時甚至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這對於蘇聯工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們非常優秀，我發覺他們對於一切最好的可能的生活方法，都非常關心，而他們對於國際事件的見識亦很豐富，時常把許多關於中國革命的巨大的問題提出問我。」

「在一個小學校裏，我見到一羣小孩子們正在討論着資本主義社會的嚴重的矛盾，這使我非常驚訝。」

「在另一個地方，我看見八百個孤兒在一個學校裏，得到很好的照顧，有些甚至在学习音樂。當我參觀了這個學校的時候，我不禁想哭，因為我想了我的幼年，和中國無數的孤兒，他們不但沒有地方安身，甚至連飯亦沒得吃。」

「當我初到蘇聯時，飯食是很惡劣的，但到了我離開時，牠已經很好了。」

不管情形如何艱苦，所有蘇聯的人都是熱情的快樂的——不像我們中國人。後來我才悟到要是我們的革命得到成功，那麼，即便飯食再壞一些，我們亦是一樣驕傲和快樂的。

『當我觀察蘇聯，和想起現在發展階段之前那悠長的革命歷史時，我就認清了中國要達到蘇聯這樣地步，必須經過同樣悠長的時間我們無錫的工人先時却以為革命只要「三年」便完成的。』

『當時蘇聯的新經濟政策階段剛剛過去，新的資產階級正持滿清，而集體主義則已開始，爲了客觀情勢沒有得到很好的調整，生活情況非常艱苦，富農到處燒毀貧農的房子，而保守的農民，總以爲他們的田地和畜牧比別人的好，因爲痛恨集體農場，老想退出。但政府把比較進步的農民組成集體農場，給他們以好的機械，結果收穫比舊法來得多，就這樣把舊的法生產方式克服了過來。蘇聯革命後首先是分配土地，其次才成立集體農場。我們中國的蘇維埃現在第一個階段裏。』

『由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我一直住在蘇聯，除在中山大學上正課（只有一年）外，還在一個同志那裏補習中文。後一門功課到我回國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唸完。由一九二八年，中山大學的學生間有着很猛烈的鬥爭，即所謂托派和斯大林派的鬥爭。就爲了這件事，學校終於在一九三〇年解散。學生中托派份子只作百分之三十，但潛勢力非常大。一九二九年曾經清除過一次，中國的托派份子有些自首悔過，有些則返回中國來，那時候中國的共產黨要一面反對右傾的機會主義，一面反對左傾的托洛斯基主義，而機會主義者便與托派勾結，一起反對斯大林。在中國問題的見解上托派和右傾機會主義者都主張陳獨秀路線是正確的。』

『中山大學裡又有一小部份中國留學生阻咒蘇聯，說牠的赤色帝國主義者，以至變成托派。有一次幾十個中國托派學生在莫斯科的街上示威，高呼「打倒赤色帝國主義」結果有幾人被捕，但隨後就加釋放。』

『但現在，我們的反托路線已不只是黨內的，而是黨外的反漢奸路線了。』

李立三路綫

『當我回到上海來，我是女工部的負責人，在工業區域工作。開頭，我被委任爲全國總工會的書記，但因自覺不能勝任辭去，以致受了黨的批判。』

『就在這時候，反立三路綫剛剛開始。黨內的鬥爭非常劇烈，弄得無法好好進行工作。黨一面要反對左傾的立三路綫，一面又要反對何奚云和羅卓龍的右傾之詞，而右傾份子已反對黨和立三主義者。當時在工廠工作實在非常困難，因爲黃色工會相當強大，那李立三在工人之中，亦有很大的勢力，工人們都很喜歡他，認爲他是一個很好的領袖。』

『工人們依着李立三路綫，舉行了一次大示威，結果有許多工人和共產黨被捕。自此之後，工人們很恐慌，工作亦就更加難於開展了。一九三一年春，我們在一傢絲廠裡舉行了一次大罷工，稍後許多黨的組織份子終被發現多致有大批人員被捕。這不幸事件對以工人運動的影響很大，有許多工人，因爲受了警察的賄賂和別的引誘竟至叛黨。』

「當時黃色工會的力量很強大，這是並非偶然的：他們取得合法的地位，而且有很多的錢可以收買那些落後的工人份子。一到工人與資本家鬥爭黃色工會的領袖便出來調解，工人們雖不喜歡這種解決學端的辦法，但都以為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的。」

「一九二三年平漢路罷工時，中國的工人運動是很高漲的，自此之後，繼續增高，直到了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暴」失敗之後，便到了牠的最低潮。自此直到一九三四年，牠方才重新開始。」

「當時上海總工會的總書記是×××，現在是第二方面紅軍賀龍部的政治主任。有一天，他被捕了，而我恰好在他被捕之後半個鐘頭去看他，所以差點兒亦給捉進去。」

蘇區的工人

「一九三三年，因為上海的情形非常惡劣，我幾乎要離家一步亦不可能，乃不得已動身來蘇區。我經由汕頭，進入福建蘇區，然後再到江西。由福建進

入江西蘇區的路非常難行和危險，而在我之後，亦沿這條路入蘇區的是德國同志李德。不久之後，有許多黨員就在這地區被土匪架去。當時我只幾個隨身的衛士，到了安然進入蘇區，我的興奮和快樂，是無法形容的。

『我在蘇區負責女工運動。同時，全國總部亦已由白區移到蘇區，主其事的是×××。在蘇區裏，有許多的婦女活動，一般說來，這些都是很良好的，因此我非常忙碌。』

『蘇區的革命份子使我萬分激動。而最使我感動的，是我看到全體游擊隊員，在夕陽西下，開始出發夜襲之前聚集山上，高唱革命歌曲的時候。我最盼望能看到的，就是中國民眾手執槍械，浩浩蕩蕩地出發為自由而戰的那種景象。』

『在蘇區裡，地方政府從事經濟建設，非常忙碌。蘇區裡每一個普通農民或是小孩却懂得革命的理論，這一點使我非常驚訝，比起他們和他們的經驗來，我覺得自己非常落伍！』

『在我們的總工會裡，有一萬婦女在和三十萬個男工，每個工人從早到晚，都非常忙碌。女工中的革命活動是非常積極的，每天他們分出時間來給紅軍的士兵們製作鞋子和衣服。女工的丈夫大半都是紅軍，而那些來自都市的女工，他們的丈夫除國老的不說，差不多全都加入紅軍在前線作戰。』

『蘇區對待武士的態度，跟中國別的地方完全不同。那些到前線作戰的，非常受人尊敬，而他們的家庭亦因他們之得在前線感到快樂光榮。農民們都分得土地，因此都曉得應為保衛牠而與紅軍作戰。』

『在蘇區裡，工人們時常幫助士兵們修築戰壕以及別的種種工作，譬如，泥水匠的修築便最是非常出色的。而農工人們正在前線從事這種工作時婦女與兒童則在後方耕種。事實上中央蘇區後方一切的工作，都是婦女們和小孩們相負的。女工們還上夜校，而教師亦都是女人。每一個工人不管是在前方或是後方，都覺得他們是社為革命而戰，而農民們亦只留下足夠的食糧，把剩下的一切牛產品送給紅軍。黨員們到老百姓家裏，時常得到很好的款待。被邀在那

裡吃飯睡覺。

『我以前從未騎馬，到了我會騎馬時，心裡非常快樂。我一點亦不害怕，反而喜歡馳騁。』

『我在蘇區這一年，接着我們已不能不動身長征，置身於爲着未來而作的一切計劃和可驚異的成就中了。』

『在長征開始之前，我們會舉行擴充紅軍兵役的運動，結果有六千名新軍參加。同時還動員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總工會男工會員，其中包括大足的婦女，組成了赤衛隊，他們從事軍事訓練，而當紅軍開始長征時，赤衛隊的戰士便開始至前線作戰。每一縣都設有赤衛隊，十八歲以上的女性一律參加，十八歲以下的女孩則加入少年義勇團，所有女赤衛隊員則在後方工作，如昇運和看護傷兵補充給養等。在長征開始前後，紅軍和赤衛隊跟白軍有極猛烈的戰爭，我們亦非常的繁忙。蘇區所有紗廠亦開始舉行一個供給長征士兵以足夠的衣服的競賽。』

『這時候我剛好有妊，而在這情況下開始長征，使我非常之疲累。我已生過兩個孩子，一個是在莫斯科生的男孩，一個是在上海生的女孩，生後一個月就送到一個人家裏去寄養。

『每天都有飛礮到我們的首都瑞金來轟炸。某一夜，當我睡覺的時候，有一條蜈蚣在我頭上咬了一口，我到處尋找不到，怕他又會跑回來，因此睡不着覺。接着我便發了很高的熱，病得很厲害。小產之後，不得不休息一個月，而這正是長征快開始的時候。

長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我們離開了瑞金，開頭，行軍非常辛苦，雙足酸痛，每天晚上都得用熱水洗足，有許多人因此落在後頭，老跟不上大隊。但我過了相當時期以後，已能步履裕如，邊行軍邊工作了。參加紅軍長征的女性非常少，只有三十個別的工作人員。留在江西的許多女黨員都是很有能力的，

不幸，他們後來大半爲白軍所殺。

『在長征中，我們還隨軍攜許多政府所有的機械，這工作是軍事委員會組織，由羅邁（羅現在是黨校的校長。）主持的，此外還有救護和運輸等部，差不多有五千以上的人從事這種工作。』

『在長征中，我是軍事委員會轄下的政治工作人員，担負如下各種職務；像在紅軍休息的時候作演講和其他的教育工作，調查地主和他們的財產、並協助土地與財產的分配。這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爲紅軍在長征中必須保持非常良好軍紀，使經過各地的民衆對紅軍能有良好的印象。紅軍絕對禁止拿老百姓的財物，如有借用，用後必須全部奉還；不管行軍如何匆忙，紅軍士兵在借用老百姓門板睡覺之後，每天清早起身後，都必須小心將門安好，並掃淨借用的房間，如有違反，他就要受嚴厲的處罰。』

『不論任何人，都不准私人直接取用地主的東西，沒收之財物，都要經政府機關分配。而除開保存足敷軍用之糧食之外，我們還把沒收來的東西，散入

給沿路的人民，因此他們心裡非常快樂。沿路的人民都很歡迎紅軍，有許多發想參加我們，但我們並不要許多的人參加，長征是長途而艱苦的。

「在長征中，女同志們時常跟黨的負責人員吵嘴，因為她們得不到足夠的食糧，以至有時候相互間竟搶着吃。每一個人都想吃飯，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帶米，因此我們不得不調查究竟是不是每個人都帶了他的米糧。女人們吃的食物跟男人們的一樣，別的特遇亦沒有一點不同，只有在實在不能走路的時候，才允許她騎馬。我們三十個女同志沒有一個人在路上死去。」

「當時，隊伍裡有許多受傷的人，當他們看見女同志們騎在馬上，都很妒忌，爲了這事情大家吵起嘴來。」

「我們一出江酉，便把五十個女人組成一支特殊的婦女隊，由我當隊長。這特別隊跟其他的紅軍分開來，理由是一樣的；當時紅軍正與廣西的苗子作戰，生活非常的艱苦，兵士們心想女人們一定得到較好的待遇和食糧，而女人們同時又不能担任運輸工作，有些甚至沒有帶着自己的糧食，由此兩性之間便

爭吵起來。我們亦就由大隊分出來，由我們招料自己。李伯釗——現在昆前線戲劇隊的領隊——當時當政治主任，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我們在一道生活工作。在還沒有與紅軍分開來以前，我們老是吃不飽，但現在我們的糧的却很充足。李伯釗去在隊伍的前頭安排食物，其他一切的事情却由我負擔，有時則兩人一道去找尋財產應予沒收的地主。這婦女隊只成立了一個月，到了到達貴州的遵義之後，婦女隊便解散，各人分別在紅軍中從事看護或做政治工作。自此之後，爾性之間再沒有麻煩，大家一起過着同樣的生活。在長征中，所有的女同志全不跟他們的丈夫住在一道，而自從事獨立的工作，這一點是不用說的。

『到了遵義，我便在總政治部中工作。當地有着許多木匠，泥水匠和絲廠火柴廠的工人，我便幫着把他們組織起來，我們保證在我們未離開之前，把絲廠工人的工錢提高。直到我們離了遵義，這些工人組成了三隊游擊隊，起來保衛他們自己，連婦女們亦參加他們。遵義是貴州的第二個大城比貴陽還要近代

化些。

『遵義有着許多地主。記得有一次我和李伯釗去調查一個普通地主的資產，他們全家都已逃光，我們便住在他的家裡。他有着幾百個南瓜，二千斤鴉片，許許多多的絲綢和狐皮，還有幾百箱別的東西。有許多東西是藏在牆壁裡頭，但現錢却沒有找到。我們兩個從早到晚一直在這屋子裏數着這些，其中有四十箱我們隨後分發給當地的民衆。』

『縣裏還有無數的食鹽，這東西一向牠是由官府專賣的我們把牠全數沒收，用很低的價錢把牠賣給老百姓。』

『當我們進入像遵義這樣的城市時，我們便由老百姓處購買了一切必要的東西，並以蘇維埃紙幣償付。到了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我們便用由地主或官署處沒收來的東西作交換，把我們的紙幣收回。窮人們對我們這辦法非常喜歡，所以每個城市裏都有幾百個人要求加入紅軍。而在我們離開之前，我們時常在當地組織了游擊隊。』

「我們在遵義只停留十天。我們一離開國民黨的軍隊就入城了。他們拘捕和毒打被我們組織的工人，有幾個且被處決，但大部份的人却在白軍未來之前逃跑了。這地方的游擊隊非常勇敢活躍，時常攻襲白軍，使他們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不久之後，紅軍又回到遵義，但所有的工人領袖全已逃光了。城裏的人因為害怕紅軍離開後白色恐怖又將重演，所以大都逃跑。第二次我們只住了幾天，國民黨的飛機每天在天上出現，並用機槍向城裡掃射。我們大隊開拔，到了八十里外一個叫做白拉口的地方時，我們又被阻重回遵義來。這回只逗留一天。隔天早上又再度出發。在這一兩天中，我們一共去了二百四十里路。直到最後一次到了白拉口，紅軍的先鋒部隊在大隊的前頭鏖戰，而我們亦不得不從鎮上直殺過去。

「長征中許多特殊的遭遇，我此刻已記不很清了只有幾個重要的地方還記得住，特別危險的事情我倒沒有碰到過，只有一次我的馬跌下山去，活活跌死

，我却依然無恙

「我在總政治部裡的主要職務，是在路上做農民的和工人的羣衆工作。每達到了一個新地方，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便觀察士兵同志是否遵守紀律，並調查受傷的和損失的兵員的人數。如果士兵不守軍紀，便受軍法的制裁，黨員則開除其黨籍，結果軍紀非常良好。就因為我們竭力給各地民衆以良好的印象，所有的老百姓都喜歡我們，整個的長征變成了一個驚人的宣傳巡行。」

「政治部還負責調查當地的地主並判罰與善慰。每當我們開始偵查壞的地主便全部逃亡，據我所知，紅軍本身在長征中從沒有殺過一個地主。聲名好一點的地主又時常自動讓出東西來，因此他們亦沒有被殺。」

在紅軍還沒有到達一個地方之前，地主們時常散播謠言，說共產黨要殺盡所有的人，搶奪一切的財產，並且強迫所有的人跟着他們逃跑。因此當紅軍初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非常稀少，但經過了三四天的宣傳之後，大批的人就返回來了。

『在大草原上，因為地勢極高非常寒冷，我們全軍只有秋衣，這是非常危險的。在這裡死去的人數比其他的地方要多得多。這地方每天降雨，我們却毫無遮蓋，亦難生火，到處可以看見死人的屍體。但紅軍英勇的士氣仍然很高，而在這困難的環境下革命同志之間的關係更分外融洽密切。並就爲了這一點，使我們在精神上破除了萬難。自然爲了自保的本能會爲了食物的問題吵嘴，但我却從未看見有人因此打起來。有許多小孩結果是在這些蒙雪的高山上給寒凍死了。而當我們走過卑濕的大草原那難以深測的薄沙的時候，我時常看見一個強大的人，偶一不慎跌進泥沼之後，就登時陷沒不見。在這地方，死神是在四處窺伺着我們的。』

『大草原的氣候非常奇異和危險。有時候大陽明亮而且溫和，但驟然間狂風突發，帶來了暴烈的雨雪，我們就毫無遮蓋縮置身於這種風暴之中，十分鐘後風雨又驟然收斂。中午十二點鐘之後，沒有一個人能在山上動，只有早九點至十二點這時間內才有可能。一個身體衰弱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他實在很難

活下去。

『在查河附近有座高山，從山腳至山頂只有五里，但結果有許多人却無法走完這短程的山路就凍死了。山上的氣候非常冷，必須迅速越過山顛，朝山坡直趨下去。我們首先過山，隊伍裡就有九十個人在這悲慘的山上死去。看到這種景象，我心裡非常悲傷，不禁爲之痛哭。在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曉得他自己明天究竟是死是活，我們連工夫去計算死人的多少。』

『我們化了五天，才越過大草原，有幾隊却要十天工夫。許多人在這時候生起病來，有些却沒有鞋子，雙足都給凍傷。每回人的臉都瘦得無人色，而活着的人亦並沒有精力顧及那些垂死的人，但我們的決心却是始終堅強。革命精神亦仍然高漲。』

『我的那個小鬼 就在渡過大草原上某個高山時死去，他只有十一歲，由江西隨軍出發，在隊伍裡當着看護。』

『當我們橫過大草原時，我曾經和蔡暢爲食物問題吵嘴。我因爲身體好，』

喜歡多吃，但蔡暢却要我儘量少吃。我們沒有鹽，沒有油，成天吃草，但無時不感肚餓。這些草煮起來味道並不壞，在那時候看來的確是滿好的。我們有時亦吃些麥子，許多的人就爲了食物生起病來。蔡暢身體一向是柔弱的，所以在長征中老是害病。

「一過了大草原，情形不消說好得多。我想長征中最快活的一天，大概是我們到達苗人區域的阿西，在那極度的飢餓之後，我們竟看到牛肉和牛油！每個人都有充足的牛肉，讓他一次吃個飽！」

「隊伍一到晉北，我們便到瓦窑堡，黨命令我負責女工的工作和組織合作社，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全晉工人的代表大會會議席上，我便推舉爲國營礦坑及工廠的指導員。」

你問我現在是否樂觀？在西安事變前，我並不怎樣樂觀，因爲我們的軍事形勢很惡劣，雖然政治的影響倒是日趨擴大的。但自此之後，我實在很快樂，因爲在我看來，現在已有了和平，而只要停止內戰，就是我們最大的勝利。如

果西安事件不是和平解決的話，南京一定在親日份子的控制之下，那麼情形必定是十分惡劣的，我一向痛恨蔣介石，但現在，如果他與日本作戰，我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感情。我希望他成爲一個民族統一戰綫的英雄把中國由日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要是這樣我們全體在未來抗日的戰爭中，將毫不猶豫地接受他的命令。

女戰士——康克清

康克清女士並非因為她是朱德的妻子才出名。當她廿五歲的時候，憑她自己的奮鬥，便已獲得了紅軍「女司令」的徽號，而且懷着與正式司令並駕齊驅的野心。除開那位在湖北戰死的賀英（賀龍的妹妹。）而外，曾經實際上指揮過紅軍的女人，就只有她一個。四川雖曾有過一隊由女性指揮的娘子軍，但康克清所會統率的並不是女兵。她平素所最感興趣的不是女權運動，而是指揮兵士的同等權利。

一經會面，我馬上喜歡她，她有非常可愛的個性，我們並不難看出朱德爲什麼會愛上這個只十六七歲出身奴婢的勇敢的游擊隊領袖。她很漂亮，有渾圓的臉龐，端正的容貌，健康的牙齒，和一對不平常的茶褐色的眼睛。

在我們初度見面的時候，她的態度非常真摯，而我握到的，是一雙我到中國來從未握過的粗大的手。她的身體非常健康，身材比普通人來得高。均稱而

且結實，體重是一百二十磅，舉止在沉着中帶着威嚴。我相信他從未打扮過，而且永遠不願意打扮的，在她以舊式長褲子之外，就是一套普通的軍裝。當我看到上海今日那種使人寒心的怪現象——在夜總會裡，許多中國人渾渾噩噩的擁擠着；女人們穿着高跟鞋，蹣跚顛簸地走着，跟纏足一樣受罪，而且臉上塗白抹紅，打扮得全不像一個人樣；男人們則灑着香水，修着指甲，看起來好像運動也不能動一動似的，一看這些人，我便想起了康克清，當我最後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正英爽地出發到前綫，到西北那冰冷的羣山上去作戰，這是多麼動人的英俊的姿態啊！因此，當我的朋友指着夜總會裡的中國人對我說：『你想在日本軍加以佔領之後，這些人還有什麼希望呢？』我便私下感到滿足的說：『啊，你要曉得，中國還有另外一種人呢！』

當康克清用着沙沙的發音和我對談時，她一邊用鉛筆寫着粗大的中國字，似乎感到天真的自得。談到作戰的問題，她表示人數多少固然是個問題，但武器亦很要緊。她還用筆劃出她在前綫和後方之混活動的生活曲線，我正想問

她對於所謂婦女問題的意見，她馬上阻住我說：『我同男人們一道工作的時候多，對於婦女問題，因為工作關係，並不很關心。至於蘇區婦女生活的情形，我恐怕說不出來，因為我一向不大跟她們在一道。』

『你以為自己跟男人們一樣有能耐，』我追問她，但是，一般說來，在革命工作方面，你覺得女性比起男性來怎麼樣呢？』我曉得中國的女性，一向是被人們認為要比男人來得堅決的革命者的。

『一般的說』她終同意的說『中國女性的政治意識要比男人低，然而，因為她們是頂受壓迫的，所以只要有機會，她們便很快地覺醒過來。只要終她們自由，她們能够做很堅苦的革命工作。在蘇區的邊區，有許多女人正跟男人一道並肩作戰。但農民游擊運動，却全都是男人負責，這些游擊隊都是很強壯很活動的，當白軍停止進剿的時候，他們要獨立行動，進攻他們或擾亂他們的後方，而婦女們因為身體較弱，所以不能勝任。但亦有例外，與國的女游擊隊會用梭標，但大半時候是用槍去進攻敵人。有些女人，多半是勞動階級出身的，

亦曾在江西的前綫跟男人一道作戰。但通常她們是執行交通或救護的工作。四川還有一隊約八百人的四川婦女獨立義勇團，接受戰術和政治的訓練。

「蘇區內，在軍事革命工作上真正是二級的和重要的女性，只有一人，那就是賀英。可惜在還很年青的時候就被殺了，她曾指揮過一師步兵（全是男性），我非常佩服她。」

「女性在紅軍裏最大的麻煩，就是她們時常要生小孩，這對她們的革命很有妨礙，有許多人還因此而致病。毛澤東的太太剛在此地（延安）生下她的第五個小孩；蕭克太太在長征中差一點爲了生育死掉，她的男孩子是在大草原上生的，所以我們都叫他「草原的嬰孩」；賀龍的老婆亦剛剛把她那過歲的小女孩送到西安的一家人家裏去寄養。」

「我很喜歡小孩，但自己可不願意生育，因爲想好好保養我的身體，以便在軍隊中工作。我時常玩籃球網球，和跳遠跳高，保全我健全的體格。」

當時延安會爲着離婚的問題起了次「內戰」，因此我詢問她這問題的意見：

『我認爲離婚應該是自由的和輕便的，假如兩個人在政治上有了衝突那麼他們絕對必須離婚。兩個人都應該是自由的，不誰都能夠跟他或她所喜歡的另一个人結合。』

『蘇俄的女性之間，是否還有階級意識存在呢？』我問。

『閱讀的時候是有的，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農婦之間，曾有着階級意識的磨擦，但在長征中一同受苦之後，這問題便完全解決了。』

接着，她問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是屬於那一階級的？』

『我是一個無國籍的流浪的自由職業者』，我回答。

康克清認爲這是很好的接着就說：『曾和我談話的外國人，只有你一個，斯德特梨曾經見過，但沒有談過話。你獨自跑到這裏來，實在真勇敢』。

當她臨行之前，她摸摸袋裏，拿出一張照片給我，那是一張西藏土人的相片。

『你曉得，除開幾件衣服之外，我是一點財產亦沒有的。我連朱德給我的

信都沒有保存。這張相片是長征中經過大草原時拍的，是蠻子的相片，現在特別送給你，我們在長征中很難拍得一張相片，所以這是非常珍貴的，我想你一定喜歡牠。」

接着她便英武地碰着腳後跟，向我立正告別。

稍後，我又曾和她，朱德周恩來一道在總司令部裏吃飯。她頑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這位紅軍總司令亦微笑地看着他這個年青的愛妻，心里好像有說不出的高興。她提起他時從不曾稱呼他爲自己的丈夫，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叫他做「同志」。我笑望着他們兩個，心想他們是多麼罕有的一對。而且各自有着多麼惹人敬愛的個性呵！他們是這麼誠實坦率，又是這麼天真無邪！他們兩個，就像百鍊之鋼，雖然一道經過了十年的險惡的戰爭，但在他們，却恍惚在體育坊裏，做了一次小心而自然的健身訓練似的。

朱德，這位由中國軍閥時代產生出來的年已半百的老戰士，由一個孤獨的個人，抱着不顧一切的決心，緩緩地但又頑強地尋得了新的革命鬥爭的形式，

奪得了共產黨。而他這個年僅及他的一半的年青女戰士，却由內地的革命鬥爭中，卵生出來。是朱總部隊所解放所保護的千百萬反叛的集團農民中的一個——是中國革命的最新的產物，曉得學習閱讀坭牆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標語，並且像她所告訴我的一樣，從不相信任何神佛和迷信。

然而康克清的故事，並不是她個人的，而是那些自一九二六年起，就在內地從事於廣大的土地革命鬥爭千百萬青年農民的故事。

「我的母親每年要生一個女孩，而七個女孩中，有六個剛生下來就送給別人家，因為我父親是一個窮苦的漁夫，要養活他那三個男孩已夠困難，自然不願意多養他們所不喜歡的女孩子。我們並不是賣出去，而是送給人家，在長大後當他們的奴婢，農事的帮手，和家庭的僕役。我是一九一二年生於江西萬安的，生下後一個月就送給一個農民家養。這農民沒有孩子，跟他的雙親和三個兄弟一道過活。他自己是一個窮佃戶，二個兄弟是僱農，另一個兄弟却有一個老婆，一半在家操作，一半給地主僱用，我們這一家全都辛苦地操心維持生活

。我一到了可供役使的年齡，便撿拾柴枝，看顧畜牲，和割野草喂豬。因為這農民他的老婆成天在田地裏工作，所以到了十歲，除一切的家務全由我處理外，還要到田里做工，和織草繩換錢。

一九二六至二七的農民運動

在我十四歲的時候，縣裏起了幾次水災和一次饑荒，因此我們不得已撿柴了農務，全家實在窮不可耐。在這時候，剛好是一九二六，國民黨開始北伐，有一個國民黨的工作人員（亦是共產黨）到我們縣裏來，向農民說明農民的問題。我亦在養父馬上受了他的影響，當了鄉里隨後組織起來的農民協會的主席。我亦幫忙他在老塘灣做這工作，自己則加入同年由國民黨組織的婦女協會。

雖然我有十五歲，而且在一九二七年我還不會讀不會寫，但我却充當區裏十村的少共團的工作視察員。我在加入少共團之後，我富了，少年先鋒隊的隊長，而恰好在這時候，大革命失敗了，國民黨開始清黨，爲着逃難，我藏在墜在離我們家約五六十里的山上。國民黨拿着一張必須捕捉歸案的共產黨員嫌疑

犯的名單，告訴村里的人說，要是他們我們找出來，全村房子就要成平地。要是村里的人能够保證他們不是共產黨員，那麼當局可以寬赦他們。我的義父和他的三個兄弟都是共產黨員，藏匿在另一個地方。於是村里的人就託人告訴他們倆人和我說，要是我們兩人回來，他們願意保證我們，因此我們三個就回村里來。然而，許多被保證的人一回村裏來馬上就被捕了，地主正乘這機會報仇。在萬安縣我們這一區里的十個村鎮中，一九二七年二月被殺的約計一千人。

（下二百五十字畧）

『在這可怖的階級鬥爭的時日里。地主們僱用的民團是頂反動的，負責尋覓革命份子，以及執行大部份的酷刑的都是他們。地主們亦幫着追捕，各村的窮人亦被迫幫忙他們，因為他如果不這樣做，生命和財產都要發生危險。』

『我因為得到村里住戶的保證，幸而沒有被捕，但在國民黨召集的民衆大會中，有人想出賣我，要求我到會自首懺悔，我拒絕了。當時村里的人都圍着我，代我辯護道：「她只是個十五歲的小女孩，憐得什麼呢？她並不懂她嘴裡

辦的那些話」。我沒有哭，始終拒絕他們，但心裡却很害怕，因此朋友們都催我趕快回家。有些共產黨員在當時投降了國民黨，但我仍然要為革命工作。許多同志的後殺，使我心裡非常憤怒，我的革命志願愈加堅決了。我曾跟幾個同志計劃使運動復活，但黨的組織已不存在，雖然區委的負責同志並沒有遭害，那六七個領袖都脫逃了。

「當時我有了一個新問題：我的養父雖然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他的思想却仍然是封建的，他預先議好一場婚姻，要我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店員，而且已着手準備婚禮了，我想逃走，但養父却把我領在一間小房子裡。這時候是一九二八年。在結婚的前夕，村裡的革命者接到紅軍的一封信，說他們就要開到村裡來。接着我親眼看見紅軍的兵士朝村裡開來，我的叔叔告訴我，他要來參加。我求他帶我一進去，但他拒絕我。紅軍稍作逗留從事小規模的宣傳工作。就在隔天，我由那小屋子逃出來，加入了他們。」

赤色游擊隊

『紅軍要求本地所有的共產黨員加入，並籲請農民大眾支持他們。我參加這種煽動工作，帶着少年團到農民中演說。但紅軍並不想久駐，接着留下了在當地組成的游擊隊員，便又出發了。我們害怕紅軍開拔之後，國民黨又要殺害我們，因此村里隨軍出發的差不多有一百人。我和六個年紀在十九歲左右的女孩（有些是少共團員。有些全未加入組織。）亦加入了。就這樣我在十六歲，即一九二八年加入了紅軍。當時我們只帶着槌子和鐮刀，但沒有紅星。

『我們參加的是朱德統率的四路軍，本要開往遂川。但敵人已經到了那地方，所以我們全都開江西寧岡縣的井崗山，這時候是一九二八年八月。井崗山當時是紅軍重要的後方。

『從萬安縣加進來的我們這一百人，並沒有正式加入紅軍，都是游擊隊的組織者。我們組織游擊運動。把紅軍的槍分給他們，有許多人還舊鄉工作。我是游擊隊的一個領袖，但從未帶鎗，只做組織和宣傳的工作。

『我們在井崗山約近四個月之後，國民黨便進攻井崗山。井崗山是一座險

崎的高山，頂上都是寬平的，由山脚至山頂，要經過五座關，三座是大的。兩座是小的，因此敵人的進攻不容易得手。國民黨軍隊由八月起圍山，一直到十一月還不能攻下。靠着紅軍主力便下山來，只留下彭德懷的第五軍在那裏守衛。

井崗山上一共約有一百個女人，由我們區裏來的女人只有十個到十一個而已。

與朱德結婚

一九二九年正月，朱德和我在井崗山上結婚（我個人六個月前即一九二八年八月曾在遂川見過他。）當時我是十七歲而朱德是四十三。我們究竟是在那一天結婚，我此刻已經忘記了。我們並沒有舉行婚禮。自從結婚之後，我差不多始終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〇年佔領了吉安之後，兩人曾經分別一年。至於我們並非經常住一起，那是不用說的。我們從未生過小孩，因為恐怕有了小孩會阻礙我們的工作。

『當我初次碰到他，並沒有立刻浪漫地對他鍾情。不過因為他生活跟小兵一樣又做着小兵的工作，所以非常喜歡他。當時所有人全都敬愛這位革命的領袖的。我們兩人是最好的同志，但一過了這個過渡期間，我已不能不承認我大概已對他發生愛情了。』

『當時朱德的妻子剛已死去，她是一個革命的女子，名叫吳玉蘭，一九二八年在湖南的來陽和他結婚，但在同年年底便給國民黨殺害了。我只在井崗山上見過她一次。』

『八年來我從未跟朱德吵嘴過，有時我給他一點小小的批評，但他平常的行爲總是對的，我們兩人亦從未命令過誰。他生病的時候，我把他當同志一樣的服侍他，至於他的衣食，我可從未關心過，這些是由他的勤務兵料理的。』

由井崗山到長征

『我們一從井崗山下來，我便是一名游擊隊員，我時常帶着鎗，但沒有打過仗，只做煽動的工作。當我的思想是：我們必須與所有的優勢者作戰，第二』

次大革命不久就會到來的。雖然我們當時的處境非常艱險，但我却不怕一切的困難，因為革命不用說時常是一種困苦的工作。由井崗山到吉安，在我個人的生活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經驗。

「我們留下彭德懷自己的一千人，由山上原有的一千個土匪在井崗山。這些土匪是于超和袁文才的嘍囉，他們在紅軍未來之前，就佔有了井崗山，後來才跟紅軍合作。朱德和毛澤東領導的第四路軍，和游擊隊員（只有一百人）。想開向贛州去。第三師國民黨的軍團，到填住了到贛州去的大路，所以我們只作了一次小接觸。遂即後退，轉向銅鼓，那裏有一小隊紅軍，即第二和第四派遣隊駐屯，雷羅炳輝亦就在這時候領導一隊白軍叛變，加入紅軍來。」

「在銅鼓附近，我們和師團國民黨的軍隊接戰，打敗了他們，因此我們安然地開入銅鼓，休養了一星期。接着國民黨的軍隊又向我們進攻，我們便離開了銅鼓開到福建的汀州。在這次戰鬥中，紅軍殺死了國民黨的一個師長。」

「我們在汀州住了二個星期，傅連昌醫生亦加入了我們，這是第一個加入

紅軍的醫生；紅軍知道他同情我們，所以把傷兵送到他醫院裏。這時候紅軍亦經過了改編和擴充。在福建龍岩縣附近的小鎮高陽的游擊隊只有十支鎗，因此第四路軍開到那裏，打敗了國民黨的部隊，再由此佔據了永定。接着又西到江西，佔了大庾、南康和新豐，這正是李立三路線要求攻打城壘的時候。

第四軍不久又開到瑞金，再回閩西進出，佔領了汀州，龍岩上杭三縣，同時並進入粵北的梅縣。我們在梅縣只有天功夫，曾舉行過一次民衆大會，發覺當地的羣衆都是很革命的。第二天國民黨軍隊已經追到了。我們那時候只有七八千人，和四五千支鎗而已。（井崗山時只有一千支鎗）。

離梅縣九十里，有一個地方叫馬頭，紅軍開到那裏，但國民黨的軍隊沒有攻過來，因此我們又再度進梅縣。敵人在城內應戰，因為他們的武器比我們的強，因此我們又回到贛南的尋鄔和閩西的武平。紅軍在梅時雖然只逗留過一天，當地甚至連商人們都沒有逃走，但國民黨軍隊一開入城內，便殺死許多工人學生和貧苦的農民。

「紅軍接着闖到贛州附近的興國，軍隊便在此休養改組，這是一九三〇年前半年的事。再後曾進攻吉安，但沒有打下牠。因為李立三路線命令紅軍進攻大城市，紅軍甚至曾進攻南昌，結果並沒有攻破。接着我們便回到湖南。

『二個月後，彭德懷離開了井崗山，一九三〇年八月，他佔領了長沙，停留了十日以後，便開過來與朱德的會合，因此第四和第五兩部紅軍便會合了。兵力大概由一萬人到一萬二千人。

『自此之後，第四和第五兩部紅軍便沿着贛江向江西移動，在湘贛邊，打過幾次仗，並且向吉安進發。但我們還沒有到吉安城，當地三萬個強壯的農民已把該城佔領了。

『佔領吉安是一九三〇年八月里的事。當時我們擔任「少年學校」前短期的校長。這學校里的學生都是羣衆和紅軍的幹部。我從一九二九年在井崗山的時候到一九三〇年下半年，非常用功學習，開頭先從標語口號之類學起，並沒有私人的教師，結果已能閱讀報紙。現在我已能够寫寫關於紅軍的工作一類的論

文了。我從沒有讀過單行本的小說，但定期刊物如婦女生活之類倒是常常閱讀的。我讀過共產主義的ABC，列寧主義基本教程。以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報告。我對於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很深的認識，現在正在理論方面用苦功。

「不久之後，我被任爲總部衛兵團的隊長，這時候，紅軍中只有我一個女人，別的全部担任政治的工作。我時常帶一支鎗，有幾次還令全部隊員準備作戰，但戰事倒還沒參加過。自從我一九二八年離了瑞昌以後，差不多每一天都在戰鬥中。但我一點亦不害怕，雖然我從未會上過火線。每個女性，一上戰場開頭總很慌亂激動，但後來便一點亦不害怕。我隨總司令部去了六個月，主要的是從事士兵間的政治和教育工作。

「六個月之後，我被調到交通派遣隊去，等到「第一次圍剿」結束，又把我調到總司令部來，担任視察前方交通工作的視察員。

「在「第一次圍剿」和「第二次圍剿」的上半期，我全部時間都在前線上跟朱德在一道，但工作部門是不同的。

「第二次圍剿」將近結束的時候。我回後方來，在軍火庫工作。我們從國民黨軍隊奪來的槍械彈藥，完全集中在這兒，紅軍的一切軍火完全由這裏取給。當時我們的軍火非常充足，庫里藏有來福鎗一萬支、舊炮五十至六十尊山砲三尊，平射砲一二尊。我保不曾奪獲過一架飛機，但在「第三次圍剿」時曾射下一架，不過落在敵軍的後方。在這時期，國民黨運輸軍火的方法非常笨拙，因此在戰時奪獲我們所需要的軍火，是非常容易的。

「在「第三次圍剿」開始之後，我又回前綫來，在前方總部里負責少年團的工作。當時我們的部隊正向贛西移動。直到「第四次圍剿」結束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轉到瑞金出席第一次全蘇維埃代表大會，這是一九三一年年底的事。這時候，我在革命軍事委員會電訊局里擔任一個非常重要而機密的工作。我在一九三二年已正式入黨。

「一九三二年的上半年，我被派任婦女義勇團的團長，隊長約二百人。這義勇團是在雲都組織的，接着就開到郡城瑞金，委託紅軍大學訓練。團員都是

農民，大半是當地的人，在大學里受了六個月的訓練之後，便派到各農村工作。在這時候，因為我價率也們，所以亦經常上軍事科學的課，隨後又被准許昇為紅大的正式生。在學校裏，我得到了許多學識，政治水準亦大大提高，我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在班里考得第二名。

「一個中學生名叫梁英的亦考入紅大，我們是最早進紅大的兩個婦女幹部，工作跟男人一樣緊張。梁英因為缺乏軍事工作的經驗犯了許多錯誤，而當時又正是黨內因立三路綫發生糾紛的時候，梁英還同情反動派，否認幾個被罰的同志是反革命的，因此學校在她畢業之前把她開除。當時她已經結過婚，至這個人後來如何，我一點亦不知道。」

「在我畢業之前，政府派我到後方去視察救護工作。回來之後，我便擔任紅大某班的講師，作建立蘇維埃和創立紅軍等問題的演講。但一個月後，當局又把我調到前方，在前方司令部里任職。稍後才回後方，直到長征開始，我一直擔任講師的工作。」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有一次我正在後方，萬安和贛州之間觀察黨務，無意間竟與敵人遭遇，因此不得不從事作戰。當時我被當地的三百士兵推爲司令官，一直戰了兩個鐘頭，後來敵人終於被迫退却。我不曉得我究竟射死了敵人沒有，但我的鎗法一向是相當準確的。我覺得這是我最快活的一天。對方得這支軍隊是我指揮的消息，非常害怕，聽說他們會這樣說：『朱德的老婆來了，她是非常兇猛的。』自此之後，我便得到『女司令』的綽號。

長征

『在長征中，我一直跟朱德在一起，我們每天見面，但從未關心他穿的吃的等等事情，這是他的勤務兵的工作。朱德並不喜歡女人只做家務，我當時忙得不可開交，連自己的衣服都沒工夫洗滌。在長征中，我的工作照顧民衆。

『我在長征中沒有得到什麼特殊的經驗，長征對於我正如長途的散步一樣。有時我亦騎馬，但十分之九的時間，却跟別人一樣步行，除負着自己的行李外，有時還幫着身體較弱的人背負重物，我時常挽着三四支步槍，想藉此鼓勵

別人家，朱德亦常常這樣，他騎馬和步行的時間各佔一半，給別人留個榜樣。我們穿的只是草鞋，一到夜裏，大家便一道宿營，各個領袖，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都聚在一起。我們的隊伍分成兩列，有時前鋒和後衛要相差竟達兩天之久。

『我們在路上經過的每個地方召開羣衆運動，散播政治的宣傳。沒收地主的財產，把牠部分給窮人，所以老百姓們非常歡迎我們，尤其是四川貴州湖南和雲南的民衆，歡迎我們尤其熱烈。』

『我想在這征中，最困難的地方該是興川的卓克基和毛兒蓋。在這兩個地方，我們一點吃的東西亦沒有，只好用生麥，青草和樹皮充飢。在蠻子區的壩車的戰事，亦是非常艱險的。在草原上，蠻子的騎兵作奇襲，我們的戰士又因天氣奇冷，不能發揮戰鬥能力，在這時候，許多身體衰弱的，都死去了。』

『我前後經過兩次草原。第一次，我們跟毛澤東的部隊同時橫渡草原，當時分爲兩路，毛澤東一路結果無事渡過，而我們的，在半路爲漲水的黃河阻住』

。牠橫瓦在草原的中央，我們感到的苦惱，正如中國之對於大黃河一樣。因此我們又被迫回頭，在西藏度過冬天，每日吃着馬肉，牛肉，羊肉和牛肉，朱德亦在這裏得到牠那隻碩大的一見到沒有紅星草的人便高聲嗥吠的康狗。

『朱德自在卓克基與毛澤東分手之後，互相間差不多有一年未曾蒙面。當時毛率領的有三軍，朱領的則為兩軍。

『一九三六年，我們開始跟徐向前的五個軍，總共七個軍，由西藏出發。同年十月，我們終於在甘肅的會寧會師。

『當我到了陝北，我便入黨校唸書，現在則入抗日軍政大學。我現在的希望是能夠得到姓賀龍的妹妹一樣，擔任實際工作，做個軍事的指揮官。朱德很同情我這志願，他要我求得充分的軍事學識，以便在將來能夠指揮軍隊，我想我一定能夠成功——我對軍事科學已畧有信心，我從朱德處學習了許多，就是他性別人的談話，我亦是小心靜聽的。

『在紅軍主力中，只有兩個女人曾充任過指揮官，一是賀龍的妹妹賀英她

已在戰場戰死，另一個便是我。此外，徐向前曾在四川組織過一隊女兵，把指揮權付託給兩個女性，一是張珍珠，一是張冠蘭現在她們跟徐向前一道在寧夏。這隊女兵約有八百個女戰士，現在却已改由王聰揚指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剛發生西安事變的時候，他們正與當地的回教徒苦戰。第四軍方面當時的處境非常艱難，因為當地的回教徒都擁護幾位馬將軍，而紅軍不曉得應該怎樣在政治工作上和他們親近，以致互相的關係弄得不好。許多四川女兵給馬鴻逵俘去，有的被變賣，有的被迫嫁給回教徒，另一些則被迫擔任苦役，另一些則被當地的回教官兵砍殺。

『究竟是什麼力量影響了我，使成爲一個革命者，以及目下跟國民黨合作，在我心理上是否難以接受你這兩個問題我可以這樣回答。自然 迫我成爲一個革命者的原因，客觀上是因為我生活的貧困，而主觀上則因為我受了大革命，共產黨和牠的解放被壓迫的人類的思想所影響。其次，朱德給我的影響亦非常大，不過，他不僅影響我一人，這是不用說的。』

『在這長期的戰鬥中，我有許多很愛好的同志被殺了，但這並不會使我跟國民黨合作不來，因為我痛恨日本帝國主義者。當然，我們階級意識仍然是保留着的，我却十分願意擁護民族統一戰線。過去長期的可怖的內戰，我們全身受過，而現在，要使中國得救，除各階級各黨派通力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條道路。紅軍全體戰士，無不痛恨日本侵略者，巴不得有一天能夠跟日本人作戰。紅軍跟日軍在防地上雖沒有直接的接觸，但從我們整個的宣傳上看，我們之決心抗日，却是一點疑問亦沒有的。』

